



静静的日子细细地过

——读施铮铮《记忆碎屑》

张广星 / 文

那日,拿到施铮铮老师从杭州寄来的《记忆碎屑》,顾不上午后休息,先读为快。第二天上午,接着读。施老师的文字是需要慢品的,就像她给日记总题为“静静的日子”,我们阅读者的心境和心态也需放松下来,静静地阅读和品味。像我这样初读时的快读,是不能充分体味施老师文字之妙的。但人有时又是这么矛盾,一到手这样内外兼美的文集,忍不住要一下子全部领略一遍。而且,我不愿意放过任何一块文字和一幅图片,只怕漏掉任何一处的美。

施老师是黄岩有名的才女。在她和先生蒋文兵移居杭州之前,她以“静静的日子”为题的散文随笔,在《黄岩报》和《橘

花》《九峰》等刊物刊出,以其独特的风格,俘获了读者的心。后来更以其幽远宁静的画风,让读者认识了作为画家的施铮铮的才情。但是,施老师出众的才华,为其先生蒋文兵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所掩,并不广为人知。现在这本兼有散文随笔、诗歌小说、多年日记以及画作的文集,虽然也仅仅是选集,但我们足以欣赏并认识到施老师多姿多彩的才华、散淡自然的个性和冰清玉洁的人格魅力。

说是“静静的日子”,但谁的日子里没有波澜起伏呢?且不要说生离死别这些“人生之大者”,就是日常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孩子的出生和成长,自己职业生涯里的悲欢,家族亲人之间以及社会人际之

但谁的日子里没有波澜起伏呢?

间,也常难免“茶杯里的风波”。所以,静静的日子,前提是要有一颗能静的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能静,首先要能看破世俗功利、视富贵如粪土,看透生命的本质,能在光怪陆离的世态人情面前心无所动、面不改色、不失本真,正如一副对联所说:闲看天上云卷云舒,静观世间花开花谢。静静的日子,日子其实是不会静的。就像有一年,施老师已经定好了去巴黎的计划,再过二十来天就要有一趟长途飞行了,但意外先于明天降临,在一次下楼梯时,她不幸一脚踩空,骨折了,巴黎之行只能取消。对于一位画家来说,巴黎是艺术圣地,尤其对于施老师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次不去,以后就难得再有机会去了。如何面对生活中这些“突然”“意外”,是一种考验。

我们且看2006年1月22日施老师的日记:

躺在床上,第一幅风景是天花板,斜过眼去可以看见阳台的一角,铁钩上挂着阿溶带来的几条酱肉。晨,有一只麻雀飞来停在上啄食,不一会,飞来五只,集体进餐,发出欢乐的叽咕喳喳。

平躺着不能动的人还能怎么样?透过猪肉的隙缝可以看见冬天的落光了叶子的树枝,透过树枝看见远处的宝石山山岗上的杂木林,太阳下去了,杂木林变得幽暗,天光却白亮起来,唉!这是林风眠的山水画。

这就是“静静的日子”的主人施铮铮,面对意外,面对一动不能动的病痛,她不仅没有懊悔,没有怨怒,甚至没有着急,她平静地接受了。她还在不得不长时期卧床治疗的单调乏味的日子里,发现了一切生动的细节,从中又体会到美好的意味。连麻雀叽咕喳喳啄食女儿送给她的酱肉,她也觉得很开心,好像鸟儿们不是来啄食她家的酱肉,而是来陪她开心,陪她消遣寂寞的时光。

而在1月29日的日记中,她看到电视里正在放孙楠在唱歌,“不必烦恼,不是你的你想要也得不到……”听到这里,施老师对陪她的女儿阿溶说:“看来,孙楠这首歌是献给我的。”施老师的心情又放松多了。

静的不是日子,而是心态!这种心态不光是意外之变来临时的镇静,面对喧嚣俗世的淡然,更在于内心

保有的一点诗意。她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山水花鸟的自然之爱,也使得她的生活充满阳光。在作者的文字里,到处洋溢着融融的夫妻之爱、母女之爱、姐妹之亲,使得读者不禁羡慕并向往这个充满了艺术情趣的家庭的亲密无间。

我在施老师的文字中,还经常发现熟悉的身影,比如有篇散文《朋友阿建》。阿建不但是施老师和蒋先生的阿建,也是我们的阿建。当然,阿建与他们的交往,要比我们更早。施老师还在黄岩居住时,阿建有时一大早开了车子停在直下街口,施老师家就在街口不远处,阿建会把早上刚挖的山上兰花,送一盆给蒋先生和施老师,他知道两位老人都爱花。施老师还记得,阿建的车屁股上总是放着锄头和铁锹,他的车壳车胎和皮鞋,甚至西装上都沾着新鲜的泥。很长一段时间,施老师都以为阿建仅仅是一个喜爱养兰花、画兰花的人,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场合,听到有人在介绍阿建时,说阿建是一位知名企业家,这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在施老师心中,阿建还是一位爱兰的画兰人。

现在的阿建还是这个样子,他在老家余家坞山上兰园的时间,可能比在企业的更多,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他自己栽种和砌筑的。他还是经常一身水一身泥,如果不说他是一名画家一名企业家,很多人会以为他就是个实实在在的中年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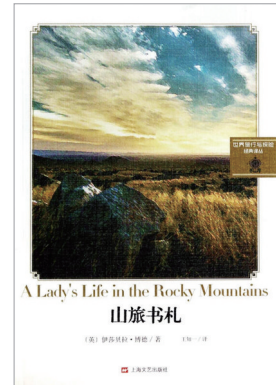
施老师热爱生活,随时种养花草,也爱画花草。女儿和朋友们都知道施老师爱花草,所以过年过节时,都会送来花草。1999年过年前的一则日记,就记载了画友和女儿给她送花当年礼:

楼上卧室的黑色书桌架有一只大型的缸,缸里养着二十朵白色百合花,那是昨晚上海晓群、李建、叶军生送来的,楼下的床头上有十朵紫色的郁金香,那是陈婷送给我的礼物,现在我将阿溶的两束玫瑰,红的康乃馨合在一起共45朵插在南窗的电视机旁,齐刷刷地散开成一团艳丽的火光,使老屋变得温馨而热烈,妙哉!有了这么多的花儿,才叫做过年呐!

能在现实世界中看淡、放下,尽情拥抱生活的人,施老师也算一个吧!

(压题图片由中国图库提供)

来自落基山中的书札



1561.04/B910
台州市图书馆普通文献借阅室

赵佩蓉 / 文

在翻到《山旅书札》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伊莎贝拉·博德,尽管她是十九世纪备受爱戴的旅行家,是第一位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邀请演讲的女性。封面上有一行英文引起了我的兴趣:A Lady's Life in the Rocky Mountains。凭着浅薄的世界地理知识,我知道落基山脉是北美洲的“脊骨”,山脉高峻,气候多变,是尚未被驯服的“野地”。

伊莎贝拉·博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1873年秋天,年过四十的伊莎贝拉·博德穿着夏威夷骑装(半长紧身外套、长及脚踝的裙子、土耳其长裤),骑着名唤“鸟儿”的马,独自开启蛮荒之旅。三个月来,她寄居农庄,采矿营,最终攀上朗斯峰。维多利亚时代,外面的精彩世界尚属于男性,女性虽被誉为“家的天使”“花园的皇后”,但大多被局限在家庭领域,女性角色带有普遍的禁锢。贵族文明模式下的淑女旅行,不外乎豪华游轮奢华服饰的炫耀。伊莎贝拉·博德却说:“我渴望急劲的风,重叠的山头,大松林,夜间野兽的吼叫,诗意的自由,以及无与伦比的快乐山旅生活。”晚餐的特征是油腻和黑苍蝇,骑马摔下来,左臂像摔烂的果冻,这种“无所不宜,行动自由”的荒野旅行,无疑是女性勇气的宣言,是对时代的一种反抗。她在旅途中寄给妹妹的17封书信,讲述传奇时代的西部往事。《山旅书札》就是这些书信的结果。

《山旅书札》以简练的文笔展示了北美高山雪域的壮观。“大而深的峡谷延展向西,松木覆盖的山岳突然拔起,形成了暴雨峰的尖端,也都向西延伸,所有的这些美景都只是为了衬托——穿入云霄,如珠光般幽然纯净,孕育着暖阳微红的光芒——有‘北科罗拉多勃朗峰’之称的朗斯峰,它高耸、孤立、可怕又宏伟的挺拔双峰。”作者眼中的高山是粗犷的不可亲近的,同时也是异常美丽的:“东边的山脉已由本来的灰色变成粉红,接着加深成玫瑰红、酒红,最后变成了晶莹清澈的纯紫,而此时,重重的山巅及断续的松林也在的一瞬间变成深浓的蓝影。”作者迫不及待地要将其一生都在寻找的奇妙见闻告诉妹妹。想来,伊莎贝拉应该是对色彩敏感文字非常敏锐的人。这种敏感让她的文字即使采用生活化的笔触,完全没有修饰上的藻饰,照样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对色彩敏感的人,必然情感丰富细腻。作者对自然的嘉年华似迷似醉,充满热爱与崇敬。《山旅书札》不是从一个地方转换到另一个处所的行程记录,而是在每一处陌生中,用双脚去抵达,用双眼去感知,用心灵去谛听。像蚌一样,作者默默地承受零下30摄氏度生存环境带来的一切苦厄,然后缓缓地吐出丰润的珍珠:人们可以自然地习得对于大自然的崇敬。大自然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慰藉力量,是无与伦比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落基山脉当时养育的多为干粗活喝烈酒的西部拓荒者。《山旅书札》也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蛮荒与文明界限不明,亡命徒、贫困的移民,伐木工人,各种精神方面的病人涌聚,搏斗、谋杀、砍杀、枪战屡见不鲜。伊莎贝拉将相当多的笔墨献给了“山中的吉姆”。吉姆的样子令人吃惊:他是蹬旧高筒靴,一件皮衬衫,上面套着三四件纽扣的破烂短外套,加上独眼,是最丑的坏蛋。他性格冲动,动不动就勃然大怒,过着不讲法律的亡命生涯。但是,在野蛮的西部,女性的影响力仅次于宗教。伊莎贝拉·博德这样生动的异城女子的出现,刺激了吉姆,他完全抛弃了“粗鲁的态度”,变成一个有教养的人,又不失孩童的纯真,令人乐于亲近。正是在吉姆不停地朗诵诗词,一路上尽说些有趣的话题的陪伴下,伊莎贝拉安全地度过了落基山中的山旅生涯。

《山旅书札》既有丰富的旅行经验,又有拓荒时代的记录。如果你渴望换个角度看世界,《山旅书札》是不错的选择。

被战争改变的昔日时光

——读茨威格《昨日世界》

阿风 / 文

历史不断重演,比如战争的幽灵,在过往的历史里阴魂不散,哪怕是现在,也不时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显现。也因为战争,有些美好的时间和事物片断过去了,就不再回来,就如茨威格深藏于内心、至死念念不忘的昔日时光。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传记作家,1881年出生于一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强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昨日世界》是他于1941年写下的一部自传体作品,翌年,即1942年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今年是他逝世80周年,我们重新阅读他的作品,以示致敬缅怀。

1914年无疑是对茨威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年6月他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假。那是令人难忘的夏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天空都呈现出丝滑的蓝色,气候温和……草地芳香温暖,森林郁郁葱葱,一派新绿。”29日公园音乐会正在进行,“公园里演奏着音乐,穿着浅色夏装的人们穿行其中,欢天喜地,无忧无虑。”然而音乐因哈布斯大公弗兰茨·费迪南德遇刺的消息而突然中止。8月战争爆发,一个公共事件突然闯入茨威格“私人过渡带”,从此昔日宁静舒适的好时光被战争的魔爪斩断。1933年希特勒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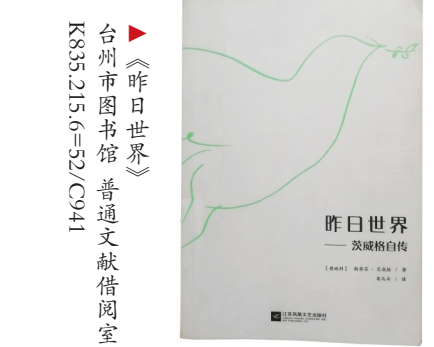
德国上台,茨威格迎来人生的噩梦,由于他的犹太血统和作品中的世界主义与和平精神,他的书被纳粹列为禁书,他本人也被驱逐。

战争以及犹太人的遭遇,让茨威格更加珍惜和感受到昨日世界的美好。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准则无处不在,事物都有确定的尺寸和重量。”“那是一个多么平静祥和的年代!”哲学家陈嘉映认为:“茨威格眼中的‘昨日世界’,应该就是人文主义成为主导观念的世界。”那时,智识和文化令整个社会羡慕、尊重、向往。在茨威格的青年时代,一方面世界变得开阔了,一方面还没有高度平民化,贵族已经没落,智识和文化填补了社会上的高位,整个社会推崇音乐、歌剧、诗歌、小说这些精神作品。如作者所生活的维也纳,“创作音乐、跳舞、看戏剧、聊天、彬彬有礼的举止,这些在这里都被作为特殊艺术培养。”“普通维也纳民众看晨报时第一时间关注的不是议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是国际大事,而是剧院的节目表。”“你一旦成为被那些顶尖文学杂志接受的作品,立刻会受到人们的高度尊重,哪怕根本不读这些杂志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这种情况在此前的贵族社会,此后的‘二战’及之后的平民化世界都不再出现,这难免让作者及其拥

趺者魂牵梦绕。

战争让美好时代消逝而去一去不复返,因而,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成了茨威格的终生追求。他反对分裂和厮杀,他要用文字维护和保卫人性。“几周之后,我决定逃离危险的大众精神病,搬到了乡下,开始投身于战时我个人的战争:与当时背叛理性的大众狂热做斗争。”1914年9月,茨威格写下《致欧洲的朋友们》,在《柏林日报》全文刊发,表达了反对分裂和厮杀,以及自己对友谊的忠诚。战争似乎唤醒或刺激了茨威格内心的创作激情,“在书中我不仅要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要直抒己形成的对时代、种族、灾难、战争的看法。”自1924年因“一战”带来的混乱秩序得到基本恢复,到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这10年,成为茨威格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创作了《三大师》《马来狂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类群星闪耀时》等影响深远的作品。

苦难和颠沛流离让茨威格变得清醒睿智,也让他对时代和遭际充满了失望之情。他在《昨日世界》的序言里写道:“确实有很多很少有人像我一样,被迫与自己的根、成长的土地分离。”“我见证了有史以来理性最可怕的败退,以及残暴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疯狂的胜利,这并非我所愿。”因此,他认为他是这段历史的“牺牲



品”,“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我们这一代人无路可逃,不能像过去一样置身事外……”茨威格写作《昨日世界》是在战争期间,身在异乡,没有资料参考,全凭记忆,“已经忘记的生活,本来就是内在的本能注定要忘记的,只有那些自己愿意保留的记忆,才是为他人保存下来的。”纵观《昨日世界》其基调是冷峻和沉重的,但那里深藏着一抹柔情,一种深切的缅怀,我们在作者宏大的叙事里,可以从微观和细节里窥见一颗柔软的心。

时代的洪流汤汤不绝,变幻莫测,往者不可留,来者不可追。反观当今时代,战争的幽灵在四处逡巡。我们阅读茨威格的《昨日世界》,那里面充盈着对人文主义柔情的惬意的都市生活的怀念,让面对纷繁复杂世界的现代人不由自主地心向往,并获得慰藉。

西班牙“东野圭吾”笔下的“福尔摩斯”

金新 / 文

多明戈·维拉尔被誉为西班牙的“东野圭吾”,其“里奥·卡尔达斯”侦探小说三部曲《水之眼》《水手之死》《最后一艘渡船》的前两部,已被南开大学西班牙语教师必田翻译成了中文,于去年末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多明戈·维拉尔笔下的卡尔达斯是一位沉默寡言、深沉内敛的探长,热爱美食、白葡萄酒和爵士乐。除了刑警队的工作以外,他也在电台广播兼职,是维戈市小有名气的“电台名人”。他的助手埃斯特韦斯鲁莽冒失,直言不讳,虽然总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他强壮的体格和习惯性的快人快语却在往会在关键时刻为案件的调查保驾护航。这一对看似水火不容、怪异荒诞的组合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与华生相比,少了些不食人间烟火式的桀骜与怪才,多了些对世间百态的深切理解与关照,从他们身上依然能摸索到深刻在西班牙民族性格底板上的理想主义与骑士精神。

作为序幕的《水之眼》是多明戈·维拉尔的开局之作。故事以一位萨克斯乐手赤身裸体地横尸于公寓为案件开端,随着卡尔达斯和埃斯特韦斯对案件调查的逐渐深入,隐秘的情感纠葛浮出水面。两位警官在凶手悉心设计的疑案旋涡中不断地逡巡,似乎对真相触手可及,却行将落入旋涡的深处,沦为罪犯的傀儡。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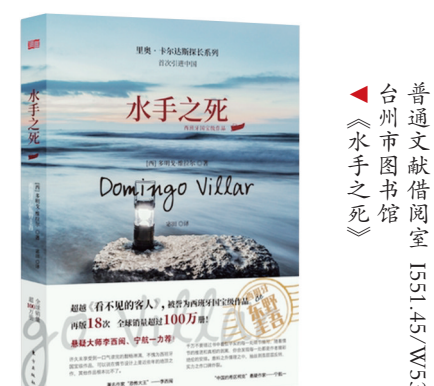
而卡尔达斯探长对细节敏锐的观察以及对真相的不断求索,令他们攀爬到旋涡的边缘,回到案件的开端来重新审视,故事情节也随之在转瞬之间出现了极大的翻转。

《水之眼》令多明戈·维拉尔跻身于西班牙一流的侦探悬疑小说作家之列,而系列小说的第二部《水手之死》真正奠定了作者在侦探悬疑小说殿堂中的地位。作者将案件的第一现场转移到了加利西亚自治区西南边陲的庞克松港。漂流在大海上的幽灵船,死去的船长回魂报仇,别有居心的涂鸦,故事打从一开始就被笼罩在哥特式的诡异氛围之中。小镇上的居民们都讳莫如深,成为了凶手背后沉默着的集体帮凶。探长层层剥茧,却发现这具新近发现的、漂浮在海边的水手尸体竟与13年前附近港口的一桩妇女失踪案有关联。凶手隐藏在浓雾中的身影似乎唾手可得,却又忽明忽暗,躲在深受这些案件牵连的人们背后,与探长进行着胶着的拉锯赛。凶手的身份一再锁定,又一再被推翻,剧情跌宕起伏,令人屏息直到最后谜团的解开。

多明戈·维拉尔将卡尔达斯探长的个人生活融入到了系列小说之中,成为了各个案件铺叙背后的另一条主线。父亲的离群索居,与妻子的离异,电台工作的不留意,卡尔达斯在生活中的隐忍与逃避与他

在办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果敢与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案件虽然扑朔迷离,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但是生活的逻辑却更为复杂,反而变成了一段段解不开的乱麻。也因此,多明戈·维拉尔笔下的卡尔达斯探长已不再是一个符号型的人物,而成为了一个有自己的烦恼、迷惘和难解之结的丰满且自然的人物形象。此外,作者选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个体来描绘人物群像,反映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多明戈·维拉尔将故事的背景设立在了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自治区,那里阴晴不定的天气,凛冽的海风与西班牙式的明媚构成了明与暗的对比。译者必田是留学西班牙的博士,非常熟悉这个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欧洲王国的风土人情,她忠实于原著,在“信达雅”中让读者跟随着卡尔达斯探长的脚步,游走在维戈市的大街小巷,种着葡萄藤的庄园,铺着细软白沙的海滩,热闹的周末集市,海边的渔村和山顶的教堂,与多明戈·维拉尔共同绘制了一幅加利西亚地理图景;时而穿插在文中的海鲜饭、加利西亚炖章鱼、海珍鸭颈藤壶、各式甜点和葡萄酒,不禁令读者的味蕾也随之而动;有关城市历史、音乐和绘画艺术的描述,给读者带来了视觉、听觉和味觉上的全方位的盛宴。



台州市图书馆普通文献借阅室 151.45/W336